

列女传译注

张 涛

山东大学出版社

列女传译注

张 涛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建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6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5607—0346—1

K·33 定 价：4.20元

序

刘向是我国汉代文化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班固曾以其与孟轲、孙况（荀卿）、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并列，称他“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汉书·楚元王传》赞语）他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起，领校王朝中室秘籍和民间收集的图书，达20年之久；所撰《别录》以及其子刘歆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七略》（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不仅开创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实际上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古代学术史。

《列女传》是刘向的重要著作之一。它同作者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说苑》、《新序》一样，都是刘向受命领校中书期间，依据丰富的古籍资料，精意编撰而成的历史故事集。在编撰过程中，刘向显然有总体的指导思想，有自己材料取舍的标准，也有一定的语言文字的加工。有人着眼于《列女传》辑古存旧、摭集众说的一面，怀疑刘向的著作权，不过是一种失之片面的理解，是不足为信的。

《列女传》以分类记述古代妇女的大量传记为内容。《汉书·楚元王传》说：“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

《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可见，《列女传》的编撰，主要是针对元、成之际后妃逾礼、外戚擅权的现实，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巩固刘汉大统，维护封建礼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有意抉发古人的盛德懿行，所载“母仪”、“女范”等等，实际上涉及甚广，其中虽有糟粕，却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客观上具体展示了妇女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和所起的特定作用，并能使后代读者从中感受到我国古代妇女的许多聪明才智、义行卓识、优良品德等。还应该看到，《列女传》所载传记，多达100余篇，现存古籍中有关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重要事迹，大抵尽汇于此。那末，今人如果需要系统了解西汉以前古代妇女的种种故实，包括查寻旧典、识辨史事、丰富知识，本书无疑是一种不可多得和具有很高资料价值的重要专著。另外，西汉时代，我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尚处于滥觞阶段。刘向笔下的人物传记，虽多“杂史”性质，然其谋篇写事、遣词用语，间或亦有匠心，在文学史上似也不无值得肯定之处。凡此等等说明，《列女传》在史学和文学上都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来，我们竟还没有对于这样一部古籍进行过全面的整理。

张涛同志潜心于两汉文史的研究，而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先后有《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略论刘向〈列女传〉的社会政治思想》等数篇学术论文发表，同时，又以很大的毅力，写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列女传译注》。在写作过程中，为访查版本南下北上，披阅材料力求广泛详备，所作校勘译注曾经几易其稿，都表

现了一种在事业上有所追求、在工作上奋进不懈的可贵精神。坚持并发扬这种精神，相信张涛同志定然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获得更大的成绩。

有感于张涛同志的诸多辛劳，又乐见“译注”的终能问世，因应著者之命，爰缀数语，是为序。

董治安

一九九〇年七月

前 言

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它为我们全面了解古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刘向（约前79——前8）^①，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给事黄门郎、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迁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刘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世说》、《说老子》（以上已佚）和《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另外，《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十三篇，今存《九叹》、《请雨华山赋》。《汉书·楚元王传》附有刘向的传。

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在秦始皇“焚书”及楚汉战争中损失极大。刘汉王朝建立后，“广开献书之路”，搜集

^①关于刘向的生卒时间，前人有两种不同说法。此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

的书籍日渐增多，昭、宣、元、成四帝“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这样众多的书籍，因来源不同，流传久远，散佚错讹、真伪杂糅、年代难辨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对书籍的整理工作就势在必行了。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应诏校经传、诸子、诗赋。他首先广致异本，积累资料，接着互相比勘，定著篇章，最后将新本缮写誊清，成为定本。一种书校勘完毕，刘向便编写叙录，介绍本书篇目，撮述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等。他还把各书的叙录另抄一份，汇编成《别录》。他在校定书籍的同时，依据内容和流别，对书籍进行分类，着手编制系统的目录。刘向去世，他儿子刘歆继续工作，仅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七略》的编写，建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刘歆又按照《七略》的分类体系，把《别录》编为定本，称《七略别录》，使其更具有系统目录的作用。可惜上述三部著作都已亡佚，我们只好借助清人辑本来了解其大概。刘向的群书叙录，保存下来的也仅有《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和《说苑》等书的叙录。尽管这样，刘向对学术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二

刘向生活在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当时，宦官、外戚专擅朝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为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刘氏政权，刘向满怀悵悵宗室之义，屡屡上书，针砭时弊，语辞切直，因而遭到宦官、外戚的压制和打击。但他没有退却。《列女传》的编撰就是他晚年坚持斗争的一个表现。

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列女传》编撰于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这里的“赵、卫之属”不仅仅是指赵皇后、赵昭仪姊妹和卫婕妤，而是指整个外戚集团。当时王太后兄弟王凤等多人封侯，掌握朝政，对皇权构成不小的威胁。可见，《列女传》的编撰动机和思想主旨是要反对女主干政，遏止外戚专权。

在《列女传》中，刘向继承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理论，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提出“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他还进一步从生理方面解释女子的卑弱。刘向要求妇女接受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和好众妾”。他反对不符合传统礼教的婚姻，主张妇女“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这种主张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是一些糟粕，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注意批判。

但是，《列女传》在这一问题上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倾向。第一，它认识到妇女力量的存在，承认她们对社会和家庭发展的一定作用，歌颂了她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它赞扬不为利动，果于行义的杰出女性，对见利忘义，心有淫思的薄情郎君则大加挞伐。第三，它要求女子行义遵礼，但当义与礼发生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又认为礼可以变通，从而扬弃了孔子的行义须体现于遵礼之中的思想。第四，它要求“妇人以色亲，以德固”，对美于色而薄于德的

女子深恶痛绝。

《列女传》的这些思想在封建时代具有积极意义，曾给人以教育和启发。《列女传》保留了不少妇女好的思想言行。特别是卷六《辩通传》的人物，有的貌丑才高，身怀治国本领，有的勇敢果断，不向权势低头，几乎没有一个不可称道。邹孟轲母的三迁、断织，齐田稷母的劝子拒贿，齐相御妻的匡正丈夫，鲁漆室女的忧国忧民，鲁义姑姊的舍子救侄，珠崖二女的争相赴死等，也都深深感染着后世妇女，受到人们的广泛传颂。这些内容，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列女传》反映了刘向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刘向强调进贤任贤的重要性，要求最高统治者礼贤下士，清除蔽贤之路的谗邪佞臣。他力主薄葬，反对浪费资财、违礼厚葬的不良风气。西汉昭、宣之后，儒家学派再度崛起，但它部分地克服了董仲舒《公羊》学派偏重法治的倾向，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注重仁义王道和礼乐教化的思想。刘向是新的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主张仁德之治，强调教化重于刑法，反对统治者残酷镇压人民。这些曾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关于《列女传》的社会政治思想，我曾有专文进行阐述，兹不赘言。^①

三

作为占人口总数一半的群体，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妇女更具

^①参见《略论刘向〈列女传〉的社会政治思想》，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

有特殊价值，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可是在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我国私有制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反映在史学上，就是轻视和忽略对妇女言行的记载。《左传》、《国语》、《战国策》尤其是《史记》有一些关于妇女的记述，但它们多未著一人之生平，只是旁见侧出，更没有详加分类。最早有意识地为妇女立传，并形成比较完整的体裁结构的，当推刘向《列女传》。“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①刘向之后，史家逐渐重视对女性人物的记载。无论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列女传》，还是野史杂传和地方史志中的妇女列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影响和启示。象范曄《后汉书·列女传》、皇甫谧《列女传》以及常璩《华阳国志》的妇女传记等一大批著述，在立传标准、叙事方法上，对刘向《列女传》多有取资。

刘向《列女传》大量收入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女子，还收入反面人物，范围很广。清代章学诚曾一再强调：“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也，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②随着封建专制政治的发展，纲常名教势力的加强，元、明以降，史家几乎并失刘向之例，专从节烈载笔，“列女”变成“烈女”。当然，刘向《列女传》中节烈的内容占有相当篇幅（集中在卷四《贞顺传》和卷五《节义传》中），也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埋下了病灶。

《列女传》的出现，使传体史书获得独立、迅速的发展。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在历史编纂学上称为传体。传体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和演变时期。起初，凡

^①王固：《古列女传》序。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记事立论、解释经典的著述都叫作传。但是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那些解释儒家经典的著述。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设立，使传体成为历史编纂的重要体例。不过，《史记》的列传又是辅翼本纪，与本纪相呼应、相配合的。刘向《列女传》的出现，最早使传体脱离经、纪而取得独立。首先，其叙事已与解经无关。《列女传》虽是采取包括《诗》、《书》诸经在内的旧文“序次”而成，但却是一部史家传记之书，《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种目录都将它列于史部杂传类或传记类。它的编撰没有任何解说经典的意图。其次，其记人也与释纪无关。《列女传》百余篇人物传记自成体系，没有以帝王世系和行事来冠冕全书，设立本纪或者类似本纪的内容。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刘向正是借鉴和发展了解经之传、释纪之传（《史记》）在体裁结构等方面的合理因素，才最后完成了单行传体的创革，并引起了一种专写人物传记风气的盛行。

传体，特别是单行传体，能够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和思想性格的刻画，反映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观念上启示了许多在野的贤能之士，使他们意识到，即使不预国政，也可以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因而受到史家的喜爱。同时，这种单行传体便于统治者表彰褒扬人物，推行礼制政教。所以，《列女传》出现不久，单行传体就得到东汉光武帝等统治者的认可和提倡。于是，在著述宗旨、撰写方式、形制结构方面明显受《列女传》影响的各种单行传体史书不断涌现，成为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向据以编撰《列女传》的先秦和汉初的古籍，许多种现在已经亡佚了，《列女传》中保存下来的它们的个别片

断，就显得十分宝贵。刘向持《鲁诗》义，《鲁诗》今亡，《列女传》几乎每篇结尾都引《诗》证事，这些对研究《诗经》和中国经学史颇有价值。《列女传》的史实、文字与其他今本古籍如《左传》、《史记》等有不少相异之处，可以利用来勘正今本古籍史实、文字的讹误，弥补其记载的疏略。

四

我国古代文学一开始就和史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文学创作是在编写史书（包括无意识地作史）中进行的，文学形象也是通过历史人物表现出来的。刘向正是在《列女传》的编撰中，发展了司马迁开创的传记文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并推出一批雏形短篇小说。

《列女传》的出现，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内容，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它将百余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女子作为描写中心，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创造。如果说汉以后兴起的杂传上承《史记》列传之法，下启唐人传奇之风，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几乎最早的杂传，《列女传》曾对传奇小说中描写女性的作品，产生过尤为重要的影响。

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列女传》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些文学表现手法。它对旧籍中的材料合理加工，一般只摄取一个事例为中心，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卷六的《齐管妾婧》采自《管子·小问》、《吕氏春秋·举难》、《淮南子·道应》等，刘向将这些零散的材料组织成首尾完具、有条不紊的传记，并通过传主解《白水》之诗，劝管仲荐贤一事，展示她的深明大义、睿智慧敏、言辞辩通。《列

《女传》有多处细节描写，如卷七的《周幽褒姒》中就安排了幽王以王室告警的烽火狼烟博取褒姒一笑的细节，从而逼真地刻划出昏王淫后的形象。《列女传》还采用独白和对话，通过衬托对比的方式表现人物性格。刘向注意以细腻的文字描写各种人物的心绪和情态，使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除了一定规模的情节和某种程度的人物形象描写，《列女传》还有一些突破史实限制的虚构、想象和附会。它不仅同《史记》等史传著作一起通过选择材料进行典型概括，在塑造人物、编撰故事等方面，为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某些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而且它本身的某些篇章就已具备了小说的雏形。《列女传》大部分传记采自旧籍，有史实依据，但也有一部分内容是刘向采摭异闻传说、街谈巷议编写而成的，主观随意性很强，为虚构人物和情节准备了某些资料，并使其成为小说的要素和片断，有些甚至就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小说了。在《列女传》中，象《周主忠妾》、《齐女徐吾》等传中的人物和情节就是从民间传闻附会而来的。

《列女传》各篇形制短小，影响了其文学手段的进一步运用，但刘向却能以省俭的笔墨，清丽的文字，使作品富于表现力。刘向在利用旧籍材料时，根据当时的习惯，改古语为今语，使之通俗易懂，也使语言具有一定的明了性、准确性和生动性。如卷一的《有虞二妃》就比《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类似记载更为明确，更为生动。为增强叙述性语言的使用效果，刘向还注意将行为描写和心理描写结合起来。《列女传》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是与它的语言使用技巧分不开的。

五

由于劝戒作用显著，学术价值较大，刘向《列女传》在西汉末年即开始广泛流传，甚至远至边郡。《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有“分列女传书”的残简文。东晋时，名画家顾恺之为《列女传》重新绘了图，使它传播更广。《列女传》也是后世众多文艺作品的渊藪。在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中的画像石上，“梁节姑姊”、“楚昭贞姜”等九个故事，皆本于《列女传》。近代京剧剧目《桑园会》，来自元杂剧剧本《秋胡戏妻》，而后者即取材于《列女传》卷五《鲁秋洁妇》一传。

《列女传》最早著录于刘向《七略别录》（辑本，下同）和《汉书·艺文志》。关于其篇数，《七略别录》和《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一说七篇，一说八篇。实际上后者所言八篇包括传七篇、颂一篇，前者所言七篇则仅指传而言。东汉早期，班昭注《列女传》，分传每篇为上下，合颂成十五卷。东汉中期以降，《列女传》十五卷本流行，原八卷本渐佚。同时后人又将原书以外甚至西汉以后的人物附益其中，使其错讹伪托处不断增多。

北宋嘉祐年间，苏颂、王回先后对通行本《列女传》进行整理，将全书删为八篇，包括传、颂两部分，其中传七篇（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每篇十五传，颂一篇，称《古列女传》。属后人掺入的二十传，自周郊妇至东汉梁嫪，以时相次，号《续列女传》。南宋嘉定年间，蔡驥在苏、王定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列女传》，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题《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或通题八

卷。今所见各本皆由此而来。今本卷一佚去一传，只存十四传。亡佚之传的传主，前人依据类书和旧注所引，或说为鲁师春姜（鲁师氏母），或说为黄帝妃嫫母，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期待着博古通识者经过考辨，提出更为详尽、更有说服力的见解。

今本《列女传》中解释全书宗旨的颂义大序已佚。每篇的小序仿《诗经》四言体，概述立传的标准和意义。七篇中每篇皆有颂，四言八句，用以评论传主。

在《列女传》诸刻本中，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刊刻最早，讹讹最少，内容最足。但此本今已不可见。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用此本影刻的《文选楼丛书》本和嘉庆年间据此本重刊的顾氏小读书堆本。《列女传》明代刻本主要有嘉靖黄鲁曾本（《汉唐三传》本）、万历黄嘉育本、崇祯张溥本，清代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和王照圆、梁端、萧道管三家校注本。^①

本书原文以《文选楼丛书》本为底本，~~校以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张溥本、《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王照圆本和梁端本。~~凡各本文字有出入，而底本与他本均可通的，从底本，不再注明；他本胜于底本的，改从他本，于注释中注明；他本两种以上相同的，仅据其中最早的一种。底本与他本文字均有误，而传中内容取自其他古籍，其他古籍不误的，不在原文中径作改动，只在注释中注明；如史实有误，或与其他史籍相异，也只在注释中注明正确的史实或注明与其他史籍相异之处。

本书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客观审慎。对《列女传》的校

^①参见《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载《文献》1989年第3期。

勘、注释，早在《列女传》出现后数十年就开始了。东汉班昭、马融，三国曹植、虞翻妻赵母（虞贞节），晋皇甫谧、蔡母邃等都曾做过这项工作。可惜他们的著作已经亡佚，仅在一些类书和旧注中保留了只言片语。清代中期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列女传》的校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王照圆、梁端、萧道管的集大成著作相继问世。不少著名学者也对《列女传》产生了浓厚兴趣，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黄丕烈、顾广圻、王筠、孙诒让及王国维等都曾作过校勘或疏解。本书对前人的成果多有吸收。为避掠美之嫌，引用时全标姓名，但均不注出处，以免繁复之累。出处见书后所附征引书目。

本书译文力求通俗流畅，用词精当，信、达、雅兼顾。译文基本上采取逐字逐句直译的方法，尽量保留原文风貌。然而古今语言差别很大，有时不得不进行意译，所以在表达上或与原文略有出入。原文有明显错讹的，参考注释，按正确的文字译出。

旧本《列女传》序跋文很多，其中宋代王回、曾巩的序和蔡驥的跋在思想、学术上最有价值。所以，本书将《列女传》宋人序跋作为附录，与征引书目一起，列在后面，供读者参考。

通过阅读本书，广大读者将会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增强古籍阅读能力，丰富中国妇女史知识，从而推动妇女宣传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在对《列女传》进行研究期间，王绍曾先生、霍旭东先生曾给以悉心指导。译注过程中，得到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支持，也得到傅根清先生、杜泽逊先生等许多朋友的

鼓励和帮助。成稿前后，董治安先生又予以热情点拨，并为本书作序。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上成稿时间短促，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张 涛

一九九〇年七月修讫于济南